学术文化

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

曾光光

[**摘要**] 桐城派的传承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传统的教育制度。书院讲学、家学传授、私人授徒等传统教育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上迅速扩展，成为一个超地域关系的文学派别。桐城派成员之间广泛存在着“师事”或“私淑”等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这些关系是维系桐城派的重要纽带。桐城派的存在是如此依赖于传统教育，以至于传统教育体制在晚清走向瓦解时，桐城派也就自然失去了生机。

[**关键词**] 桐城派 传统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5) - 03 - 0063 - 07

Continuity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to a great degree depended on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school lectures, in-house tutoring, and private teaching had help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s school, making it a school of literature which accommodated memb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Membe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formed extens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 in various forms, and these relation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bond to tie the school close together. Because of the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 Tongcheng School lost its opportunity to survive when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began to collapse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因其开创阶段的三位主要代表：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而得名。桐城派所以能蔚然成派，所以能在有清一代延绵传承两百余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中国传统教育。书院讲学、家学传授、私人授徒等传统教育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上迅速扩展，成为一个超地域关系的文学派别；师事、私淑这两种主要类型的师生关系使一代代桐城派成员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

因教育而产生种种关系往往是维系中国学术派别、传承学术思想的重要纽带。事实上，现当代中国的学术派别，抑或学术群体的形成、发展也清晰地凸现出教育的影响，若隐若现的师生关系也往往是其中的重要联系纽带。故研究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的关系，其目的不仅在于从个案的角度研究传统学术派别的传承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也为理解当今学术派别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蓝本。

一、书院讲学与桐城派传承

书院是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探讨思想的相对自由的场所。书院的创办者或为官府，或为私人，由于多有名儒讲学其间，众多弟子随其求学问道，故书院往往成为区域文化的中心与学术思想派别的发源地。古代书院以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主办学为主要特征，但至

[**收稿日期**] 2004 - 10 - 20

[**作者简介**] 曾光光 (1968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72

清代，由于政府控制的加强，书院日趋官学化，日益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坚守程朱理学，善“以古文为时文”的桐城派恰好与书院的这种变化相协调，书院成为适宜于桐城派讲学传道、传承学术的场所。桐城派文士通过书院讲学培育起众多弟子，迅速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一）姚鼐书院讲学与桐城派之立派

学术界一般认为，桐城派之立派始于姚鼐。如果说方苞、刘大櫆主要是从理论上为桐城古文立派打下了基础，那么姚鼐的贡献主要在于他通过书院讲学在队伍建设上为桐城派的立派准备了条件。

姚鼐一生在书院讲学达四十年之久，培养生徒众多，名徒辈出。姚鼐四十年的书院讲学生涯对桐城派的最终立派具有重要意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从四库全书馆辞官以后，即到江南四处云游讲学。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嘉庆二十年（1815）间，姚鼐先后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处主讲。姚莹在《姚惜抱行状》中曾叙及此事：“（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颖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1]凭此可见姚鼐当时讲学影响之大，培养生徒之多。著名的“姚门四子”都是姚鼐书院讲学时所栽培，姚莹从姚鼐问学于敬敷书院；方东树、梅曾亮、管同从姚鼐问学于钟山书院，其中管同在钟山书院时“久亲（姚鼐）指授，最承许与”[2]。

“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3]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的这句话，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桐城派立派的宣言。这句话当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纵向来看，道出从方苞、刘大櫆、包括姚鼐本人三大古文家均为桐城人的事实，以婉转方式打出了桐城文派的招牌。从横向上看，反映出古文队伍在姚鼐所在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如果身边没有一批脱颖而出的高足弟子，姚鼐岂敢底气十足地“发布”桐城派立派的宣言。

事实上，桐城派的第二代始祖刘大櫆已经开始致力于书院讲学。从六十七岁始，刘大櫆就辗转讲学于敬敷、新安、问政书院。但刘大櫆却没有取得类似姚鼐的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刘氏从六十七岁才开始书院讲学，书院讲学时间相对短暂；二是刘氏科场失利，终其一生的官职仅是黟县教谕，在书院与科举仕进紧紧相连的清代，刘氏头上显然缺乏吸引众多生徒的光环。刘氏一生最得意的弟子姚鼐亦非书院讲学时所授，而是刘氏通过私人授徒方式所培养。

在桐城派前期，于书院讲学中功绩卓著的桐城派人士还有黄贤宝、朱仕绣等人。

朱仕绣，字斐瞻，号梅崖。建宁人，乾隆戊辰进士（1748）。朱氏历主濉川、鳌峰等书院，“从游之士恒及千人，教授之盛几与姚鼐等相埒”。朱氏单在鳌峰书院的讲学时间就长达十一年，教授弟子甚多，“其成就弟子，在建宁则朱雍、黄凤举、金荣镐、金仕翺、何□诰、陈绩、李天炎等最有声，凡闽人治古文者，不问知为仕绣弟子，否则亦闻之于仕绣弟子者，盖古文之道绝续之交，得仕绣而开通之”[4]。

黄贤宝，字介卿，号心泉，长沙人，乾隆癸卯举人（1783）。黄氏是方苞的再传弟子，他在主讲环溪、仰高书院时，“四方执经受业者尝百十辈”[5]。

（二）桐城派的传承扩展与书院讲学

为有一个直观、全面的认识，现根据刘声木编撰的《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把清朝活动于全国各书院的桐城派人士列举如下。[6]

前期桐城派活动于书院的人士有（大致在乾隆年间）：姚鼐、朱仕绣、黄贤宝、官献瑶、沈廷芳、陈浩、成城、王昶、韩梦周、廖游章、张甄陶、张廷镐、周桐圃、刘大櫆、姚范、王灼、张敏求、方泽、秦濂、朱仕櫆、金荣镐、鲁兰枝。

后期桐城派活动于书院的人士有（大致年限在嘉道年间至宣统年间）：吴贤湘、吕璜、邓显鹤、蔡复午、高澍然、曾莲炬、徐敖、光

聪谐、徐熊飞、钱仪吉、钱泰吉、姚莹、单为傯、刘开、宗稷辰、温葆琛、苏源生、徐子苓、赵绍祖、蒋湘南、姚椿、梅曾亮、吴嘉宾、陈溥、陈学受、杨彝珍、孙衣言、阎正衡、杨士达、方东树、文汉光、戴钧衡、张裕钊、邓瑶、邓瑔、王柏心、郭嵩焘、吴昆田、何则贤、刘存仁、秦赓彤、顾广誉、凌泗、何如璋、王瑔、龙继栋、吴汝纶、孙葆田、范当世、王先谦、王先慎、黄长森、杨澄鉴、贺涛、赵衡、马其昶、姚永朴、李谐瑔、齐令辰、崔柄炎、陶绍学、罗正钧。

有清一代，一个文派在书院中讲学的人数有案可查的几达百人，由此也可看出桐城派的成员之多与影响。由上还可看出：桐城派各阶段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联系。姚鼐、刘大瑔自不待说，嘉道年间，姚鼐高足钱仪吉、姚莹、刘开、姚椿、梅曾亮、方东树均继承乃师衣钵，从事书院讲学；同治、光绪年间的桐城派代表吴汝纶、张裕钊及他们的著名弟子范当世、贺涛、马其昶、姚永朴等均在书院讲学。需注意的是，咸丰年间至同治初年，桐城派诸人在书院的活动处于低潮。一是此阶段有案可查的在书院讲学的桐城派人士仅有顾广誉、凌泗两人。二是此阶段的桐城派领袖曾国藩无缘书院讲学。究其原因，当与爆发于此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有极大关系。太平天国活动的主要领域如江苏、安徽、江西、广西、湖南、湖北等省正好是桐城派的主要活动领域。曾国藩曾说：“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7]在这种情形下，书院讲学显然已不可能。

桐城派人士曾经讲学的书院遍布各地，如广西的榕湖书院、秀峰书院；广东的韩山书院；浙江的杭州书院；福建的厦门书院、安澜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安徽的亳州书院、徽州书院等；河北的莲池书院；湖北的江汉书院等。书院讲学范围的扩展，显然有利于扩大桐城派的队伍。如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就与张裕钊、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张裕钊、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教授弟子甚多，影响很大，“自武昌张濂亭先生、桐城吴挚甫先生相继主讲于此，河北风气，因以大开，于是占瑔揣摩之所，一变为储才研籍之地矣”[8]。桐城派在广西的扩展，就得益于吕璜在桂林秀峰书院的讲学，据载：“当有清嘉道间，海内谈古文词者，多宗方姚，时月沧（吕璜）自浙东归桂林，讲学于秀峰十年，以古文词倡导后进，自谓得之于吴仲伦（德旋）……于是临桂龙翰臣（启瑞）、朱伯韩（琦）、马平王定甫（拯），平南彭子穆（昱尧）蔚然兴起。”[9]

二、家学传授与私人授徒

书院讲学是一种公开的、规模较大的教学方式，而家学传授与私人授徒则是小范围内的私人教育方式。

（一）私人授徒

所谓私人授徒，是指传统知识分子不借助官方抑或公开的教育机构而进行的一种个人性质的学术传承活动。关于私人授徒的具体教学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较正规的教学授徒方式。如管耘，“以文学教授乡里，远近从游者先后百数十人”[10]。这种教学方式一般以家庭为教学场所，如诸福坤，“即家延纳学徒教授，诸生就舍请业，随材指教，造就甚广”[11]。但这种有规模的私人教学授徒方式在桐城派中不很普遍。

二是较随意的教学授徒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往往表现为老师对学生的随机指点，没有固定的场所、时间。有的学生晨夕请教；有的定期拜访求教；有的跟随老师左右，随时得到老师指点。如潘眉，“师事郭麟，居与相近，晨夕过从，学益大进”[12]。又如陈经，师事秦瀛，“无岁不过瀛，亲承古文义法”[13]。再如张美翊，“师事薛福成，受古文法，随使数年，得以从容亲承指授”[14]。教学内容无外乎“讲解经义”，“批评其文”[15]。当然，最重要的教学内容还是“授以方、姚、梅、曾相传古文义法”[16]。

书信有时也是桐城派大家授徒的重要形式。如王国栋，“师事吴德旋，最为笃信，书问往还几四十年。渊源最深”[17]。

私人授徒的时限或长或短，有的仅仅数日，有的长达数年。短者如林树海，林氏“从

高澎然学古文，曾留其别业二十余日，细为指授，从容讲论”[18]。长达数年者如吴履敬，吴氏“师事张穆，受古文法二年，穆亲自督教，清业质疑，昕夕无间，偶有所作，辄获嘉许”。[19]

在私人授徒的教学方式中，师生关系的建立一般靠学生主动问学请教于桐城派名师，从而建立起生徒关系。如杨士达，“久居京师，偕四十二人联古文会，从梅曾亮往复讨论，讲求为文义法，其文亲承指授”。[20]需要注意的是，携文求师往往是桐城派文人拜师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范当世，“尝与朱铭盘携所为古文，求张裕钊为是否”[21]。范当世以此得张裕钊赏识。张裕钊曾撰文叙及此事：“余以今年三月，因通州张生謇晤其同里范生当世邗江舟次。范生出所为文示余。余读之，深叹异以为今之世所罕见也。其辞气诚盛昌不可御。洎七月，生偕泰兴朱生铭盘来金陵，复携所为文，求余为是正，且恳恳问为文法甚至。余既取其文，稍稍点定。”[22]此与薛福成携文拜师于曾国藩，刘大櫆携文拜师于方苞同出一辙。

（二）家学传授

家学传授当为私人授徒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为表述的清晰，特将家学传授单列出来予以研究。

所谓家学，一般指家传之学。[23]家学具有在某一家族领域内代代相传的特性。具体到桐城派，不能将桐城派家学仅仅与桐城派始祖方苞的后辈联系起来。如姚鼐与方苞虽无血缘或亲属关系，但他师事刘大櫆“受古文法”，成为桐城派一员，其后辈如子、孙、侄、甥，包括兄弟等，若从姚鼐学习古文，就当是禀承桐城派家学了。

家庭教育是桐城派古文家学得以代代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所论“家学”，侧重于论述桐城派家学传承的途径。其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

一是通过父子、兄弟等直系血缘亲属关系传承，这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家学传承方式。其表现形式有：其一，父子传承。如姚莹子姚浚昌“幼承庭训，又习闻其乡老师宿学讲论，慨然以古作者自期”[24]；管同子管嗣复“禀承家学”[25]。其二，直系隔代相传。如方涛，为方东树孙。他“少承祖训，诗文具有家法”[26]。其三，兄弟相传。如薛福保，为薛福成之弟。他“尝随其兄福成习闻曾国藩论文之旨。其为文循沿途径，神蕴超迈，颇据古人藩篱”[27]。

二是通过各种亲属关系传承。其一，叔侄、舅甥相传。前者如姚通意，为姚鼐侄。他“师事从父姚鼐，从居钟山书院最久，得闻论诗文要旨”[28]；后者如阎正衡，“师事其舅杨彝珍”[29]。其二，同族兄弟相传。如方宗诚，“师事从兄方东树十二年之久，受古文法”[30]。其三，同族隔代相传。如姚元之、姚柬之两人均“师事族祖姚鼐，受古文法”[31]。

三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传承，如端木百禄“师事宗稷辰，受古文法，稷辰妻以少女，承其家学”[32]。这种情况虽不多，但因其特殊，故作为一种类型单独枚举出来。

上面所举的几种家学传承途径有时会交织、连接起来，形成家学传承的复杂网络。

一种是家学代代相传情况。最典型的就是父传子，子再传子。如秦瀛、秦缃武、秦赓彤祖孙三代代代相传桐城古文。秦瀛师事姚鼐，其子秦缃武古文之“风格得之于父教”[33]。秦赓彤为秦瀛孙、秦缃武子。赓彤古文“深有得于家学”[34]。家学代代相传有时还表现为同族范围内的代代相传。如方东树的族弟方宗诚师事于方东树，方宗诚又将古文法传之于其子方守敦。[35]

另一种情况是以一人为核心的多指向家学传承方式。如吴德旋，为姚鼐著名弟子。其族弟吴瑞珍师事“族兄德旋，受古文法”[36]；族弟吴敬承“师事族兄吴德旋，德旋授以司马子长、韩退之之义法”[37]；其甥孙励“师事其舅吴德旋”；其外孙孙曾颐“深得德旋衣钵”[38]。

在传统社会中，家学传授与私人授徒对于文派的建立与稳固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在组织上不断为文派输送人员，还在文派成员之间建立起异常紧密的关系，形成牢固的关系网络。家学传授与私人授徒中所包含的师生、血缘与联姻关系，在桐城派走向终结的最后时刻显得尤为重要。末期桐城派的主要代表是贺涛、范当世、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林纾等人，其中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范当世均出自吴汝纶、张裕钊门下。姚永朴、

姚永概两人为兄弟（姚浚昌之子，姚莹之孙），范当世与马其昶分娶姚浚昌女儿（永朴、永概的两姊），被称为“姚门快婿”。在桐城派无人应和、后继乏人的时刻，师生、血缘、联姻的关系成为维系桐城派的重要因素，延缓了桐城派衰亡的步伐。

三、师事与私淑：两种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

上文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具体教育方式对桐城派传承的影响，在此还需对存在于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作一简要的探讨。

具体的教育方式使桐城派成员之间建立起具体的师生关系。除此之外，在桐城派成员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私淑。这种师生关系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时空限制，故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将存在于桐城派成员间的师生关系区分为“师事”与“私淑”两大类。

（一）师事关系

《左传·昭公七年》曰：“故孟懿子与南宫魏叔师事仲尼。”“师事”，在此指以师礼相待。刘声木“师事”来标明桐城派成员之间亲闻謦咳的师生关系，侧重指某人师从某人学习。[39]从学生这一方看，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师事”，而从老师这一方看，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师授”。师事与师授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整体。桐城派弟子师事的老师不一定是唯一的，有的人一生可能师事几个老师，如贺涛，就先后师事于吴汝纶、张裕钊；又如马起升，初师世父马树华及戴钧衡，[40]受古文法，继复师事方东树。

桐城派成员间师事关系的建立，主要就是靠上文论及的家学传授、书院教学、私人授徒等教学方式，此处不再赘述。

（二）私淑关系

私淑与师事相比，则是另一种含义上的师生关系。《孟子·离娄下》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后之学者对自己所敬仰而不得从学的前辈，常自称“私淑弟子”。[41]说明私淑所建立的师生关系并无直接的教与学，这种师生关系建立在自愿接受他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桐城派“私淑”弟子可分为三种情形：

一种是无缘求学于桐城派前辈，但又心向往之，故诡称为某前辈弟子。如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宪彝，道光丁酉举人，与梅曾亮、曾国藩熟识，“其于姚鼐文学既沉渐而癖好之，自诡出桐城门下”[42]；又如赵绍祖，“得姚鼐论文义法，闻风私淑其文”[43]。刘声木把这类人直接归属到桐城派各期代表人物的弟子行列中。刘声木在撰述《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时，每卷卷首特附加按语一句，现将相关卷的按语转录如下：

卷二，专记师事及私淑方苞诸人；卷三，专记师事及私淑刘大櫆诸人；卷四，专记师事及私淑姚鼐诸人；卷六，专记师事及私淑吴德旋诸人；卷七，专记师事及私淑梅曾亮诸人；卷八，专记师事及私淑方东树诸人；卷十，专记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诸人；卷十二，专记师事及私淑朱仕琇诸人；卷十三，专记师事及私淑鲁九皋诸人。可见，私淑弟子是桐城派成员的重要部分。

一种则不具体指称私淑某人，只称私淑于桐城派古文或桐城派，这部分人不便归属于某师的门下。故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专辟一卷（卷十一），共收入 110 人，专门记载“私淑桐城文学诸人”。

另一种情况比较特殊，这类弟子最初称私淑于桐城派，后又得机会求教于桐城派前辈，然私淑于前，后人仍将他们视为桐城派私淑弟子。最典型者如江苏吴德旋，年轻时即仰慕姚鼐，直至四十岁才有机会亲承教诲，他曾说：“余年二十余至京师，与武进张皋文同学为文，得桐城姚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读之，而知为文之不可不讲于法也……年几四十，始或亲谒惜抱先生而请益焉。”[44]吴氏虽亲承过姚鼐指教，但还是被后人归入姚鼐的“私淑弟子”之列。

私淑作为传统教育体制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对桐城派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私淑由于具有超时空的特性，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时空限制，一个文派可以通过私淑为纽带，迅速扩展自己的影响面。从曾国藩所写的《<欧阳

生文集 > 序》可以看出：姚鼐的私淑弟子遍布各地，江西有鲁仕骥、陈用光、陈学受、陈溥、吴嘉宾；江苏有吴德旋；广西有吕璜、朱琦、龙启瑞、王锡振；湖南有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郭嵩焘、舒焘。[45]可见“桐城宗派，流衍至广西”、湖南、江西、江苏，与私淑弟子有莫大关系。私淑弟子不仅在横向地域上推动了桐城派组织的扩展，也在纵向上推动了桐城派的发展。许多私淑弟子在私淑桐城派后，讲学授徒，传承桐城派古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国藩，他在私淑姚鼐后，通过收授弟子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弟子，“曾门四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诚、吴汝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曾国藩在《< 欧阳生文集 > 序》中将姚鼐的弟子分为“著籍”与“私淑”两种。[46]所谓著籍者实则姚鼐亲授的嫡传高足，非一般请业问学者可比。[47]私淑”弟子就是“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者。这种区分法与刘声木的区分法基本一致，但曾氏显然侧重从生徒的角度进行划分。

将刘声木与曾国藩的区分法结合起来考察，可对桐城派的传承作这样的描述：以桐城创始人方苞为起点，历代成员在相邻两代之间基本上具有师承关系。下一代成员或“师事”于前一代成员，为桐城派的“著籍弟子”；或“私淑”于前代成员，为桐城派的“私淑弟子”。需要说明的是，“师事”由于是一种具体的教学关系，故成员之间代代相接，如梅曾亮师事于姚鼐，吴嘉宾师事于梅曾亮，体现出严格的时序性。而“私淑”是一种没有实际教学传授、超时空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可能是前后辈，也可能相隔数代[48]；也可能是一种模糊的指向，只称私淑于桐城派，而不具体指称私淑于某人。

在嘉道以前，桐城派师徒传授的途径基本上呈现出单线流动的态势：刘大櫆师从于方苞，姚鼐师从于刘大櫆，姚莹、梅曾亮等人师从于姚鼐。方、刘、姚三人分别作为他们所属时代的文学巨匠与桐城派领袖，使一条明晰的师徒链接主线凸现出来：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以后，这种单线的师承链接发生了改变，其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桐城派流布领域的进一步扩展，个别大师显然已无力单独担负学术传承的重担；二是大师级人物的缺乏，使得姚鼐的著名弟子们得以平分秋色，“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不计私淑弟子，姚鼐的五大著籍弟子：姚莹、刘开、梅曾亮、管同、方东树的身边都围绕着不少的求学者，其中尤以方东树、梅曾亮成绩卓著，两人弟子众多，故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就单独列卷介绍师事、私淑于两人的弟子。但令人惋惜的是，姚莹、刘开、梅曾亮、管同、方东树等人虽弟子众多，却少有名世者，他们的弟子无力担当起传承桐城派的重任。姚门弟子相继去世后，支撑桐城派门庭的倒是私淑于桐城派的曾国藩，他以其特有的政治地位拥有了极强的感召力。在19世纪60年代，曾氏引领桐城派大旗，众多弟子如众星拱月般追随其后，天下桐城派似乎尽出其门下。曾国藩去世后，其得意门生张裕钊、吴汝纶担当起传承桐城派古文的重任。贺涛、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清末民初的桐城派主将基本上都出自二人的门下。总体上看，曾国藩以后，桐城派从此没有涌现出大师级的人物。大师级人物的缺乏与风雨欲来的新文化浪潮的冲击，自然使桐城派不可避免在二十世纪初走向衰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开始向近代转型。伴随着传统书院的瓦解、近代学堂的崛起，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桐城派文士失去了讲学传道的重要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崩溃，使时文成为时代弃履，与时文紧紧关联的桐城古文也随之失去魅力，桐城派由此失去了吸引士子的法宝。历史就是这样反复无常，曾经是“从者如云”的桐城派大门前转眼间就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有师无生”的尴尬局面使桐城派培养后继者的教育链条就此中断。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失去了造血机能的桐城派自然失去了生机。

①姚莹：《惜抱先生行状》，《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6，同治六年刊本。

②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58页。

③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4 页。

④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349 页。

⑤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29 页。

⑥刘声木是清末民初的安徽学者。他所撰的《桐城文学渊源考》十三卷及其《补遗》十三卷、《桐城文学撰述考》四卷及其《补遗》四卷，是研究桐城派的重要著作。黄山书社现已将以上著作合为《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出版。

⑦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247 页。

⑧[illegible]山：《谈谈以往的莲池》，《河北月刊》卷 5 第 2 期 (1936 年 2 月 15 日)。

⑨周鼐编撰：《广西通志稿·文化篇》，1949 年油印本。

⑩管耘，字美中，如皋人，诸生，师事梅曾亮、管同，受古文法。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59 页。

⑪诸福坤，字元简，长洲人，诸生，私淑桐城文学。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331 页。

⑫潘眉，字稚韩，吴江人，诸生。郭麟，字详伯，吴江人。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92 页。

⑬陈经，字景辰，荆溪人，布衣。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17 页。

⑭张美翊，字让三，鄞县人，官直隶候补知府。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99 页。

⑮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57 页。

⑯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90 页。

⑰王国栋，字守敬，歙县人，监生。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28 页。

⑱高澎然，字雨农，光泽人，其父授以从朱仕琇所受古文法，嘉庆辛酉举人，官内阁中书。林树海，字实夫，金门人，师事高澎然，官布政司经历。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362 页。

⑲吴履敬，字敬之，青阳人。张穆，字诵风，平定人，道光辛卯优贡，官候选知县。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60 页。

⑳杨士达，字希临，金溪人，道光乙未举人，官截取县知县。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59 页。

㉑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89 页。

㉒张裕钊：《赠范生当世序》，《廉亭文集》卷 2，宣统元年五色古文山房刻本。

㉓《后汉书·孔昱传》曰："昱少习家学"。孔昱七世祖孔霸为汉经师孔安国孙，世习尚书，故孔昱自称家学。(《后汉书》，第 11 册《志一》，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213 页。)

㉔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67 页。

㉕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63 页。

㉖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73 页。

㉗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84 页。

㉘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88 页。

㉙阎正衡，字季蓉，石门人，诸生，官候选训导；杨彝珍，字季涵，武进人，道光庚戌进士，官兵部主事，学文于梅曾亮。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55 页。

㉚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66 页。

㉛姚柬之，字幼琇，桐城人，道光壬午进士，官大定府知府；姚元之，字伯昂，嘉庆乙丑进士，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67 页。

㉜端木百禄，字叔总，青田人，官直隶州州判；宗稷辰，字迪甫，山阴人，道光癸巳进士，官山东运河道。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94 页。

㉝秦瀛，字凌沧，乾隆甲午举人，官刑部右侍郎。秦缃武，监生，官彭泽知县。秦赓彤，咸丰丙辰进士，主讲东林书院十余年。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85 页。

㉞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86 页。

㉟方守敦，字常季，方宗诚子，"夙承家学"。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73 页。

㊱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39 页。

㊲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28 页。

㊳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34 页。。

㊴如张裕钊一条："张裕钊，字廉卿，号濂亭，武昌人，道光丙午举人，官内阁中书。师事曾国藩，受古文法，最为笃爱。"(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285 页。)

㊵马起升，字慎甫，桐城人，诸生，官议叙同知。马树华，字公实，桐城人，嘉庆丁卯副榜，官汝南府通判。戴钧衡，字存庄，桐城人，道光己酉举人，师事方东树，受古文法。

㊶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39 页。

㊷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77 页。

㊸赵绍祖，字绳伯，泾县人，诸生，道光辛巳孝廉方正，曾署理滁州州学学正。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 189 页。

㊹吴德旋：《七家文钞后序》，《初月楼文钞》卷 5，光绪九年刻本。

㊺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45 - 246 页。

㊻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45 页。

㊼参见关爱和著《古典主义的终结》，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 - 48 页。

㊽如曾国藩，他论文私淑于方苞、姚鼐。然曾氏生于 1811 年，姚鼐卒于 1815 年，曾氏显然无缘求学于姚鼐门下，曾氏与方苞更是相隔数代。